

沈瑞英·著

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 社会秩序问题研究

On The Middle Strata Of China And The Problems Of
Social Order In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沈瑞英·著

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 社会秩序问题研究

On The Middle Strata Of China And The Problems Of
Social Order In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中国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沈瑞英
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745-965-1

I. ①转… II. ①沈… III. ①社会阶层—分析—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7923 号

转型期中国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

作 者: 沈瑞英

责任编辑: 张晓栋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965-1/D·204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代序

应关注中产阶级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

研究者已指出,中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然当前在国内学界,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来研究中产阶级论著的,沈瑞英教授撰著的《转型期中国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可称嚆矢。

有学者曾言: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毫无疑问,“问题”应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曾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强调:“提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沈瑞英教授论著的理论取向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等理论观点,其理论起点和支撑的基本假设是: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级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其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从社会系统变量视角辩证分析,在市场社会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此外,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国家,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因此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稳定关系,不仅仅在于其市场能力,还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赢得其他社会阶层广泛合作与支持的能力,取决于其是否有参与和推动政治民主的能力以及国家与社会互动、互构关系的制度背景。沈瑞英教授在本书的研究中提出的“中产‘亚健康’,社

会问题化”，当前“中产阶层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中产阶层是转型社会的“矛盾与变量”，“在缺乏健全的社会建设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是走不出公民社会的”等，都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考量与探讨。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认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科学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前几年，学界的中产阶层研究在西方理论抢滩中国情景下，中产阶层“神话”与“传说”流行，一些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然而沈著研究却冷静地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去探索和解读时代课题，并揭示了在当前中国“非均衡发展模式”下，在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状况下，中产阶层社会行为选择与个性、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正是挑战社会秩序的一个矛盾与变量；敏感、脆弱和病态的中产阶层，本身就是社会问题中的“核问题”。

沈瑞英教授著作研究善于以“问题导向”，以深入社会现实的创新研究实现学术超越，推动政策、制度与机制的建构和安排。当人们忙着在书斋研究中产阶层的人口数量、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文化趣味时，她更关注中产阶层健康、成熟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更关注中产阶层“亚健康”的制度成因，彰显了一种深层次的理论品质。尤其是在当前对“中国模式”炒得热火朝天之际，她更关注的是“中国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她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中国模式”最缺什么？没有成熟健康发展的中产阶层作为主体力量，社会现代化能够实现吗？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力’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为什么？这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产阶层文化内涵还缺乏厚度、深度和力度；中产阶层的思想观念还缺乏提炼和升华。尤其是当前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其成长发育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而这同时也正是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权力腐败泛滥、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下降等构成社会“亚稳定”之主要症结。而倒丁字形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不仅使“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渐行渐远，而且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出现“南橘北枳”和“被异化”现象。2010年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2011年初，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中显示，当前“穷困”价值观正在流行，约1/4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同时人们更倾向于将“穷困”原因归

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而较少归咎于个人层面的原因。2011 年报端披露,我国每年签订约 40 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 50%,33.3%的企业预计这种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我国企业每年信用缺失导致损失达 6 000 亿。又如法律是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然同年中国法学网对业内人士进行网上调查显示,认为我国法律实施状况很差的占 60%、较差的占 20%。显而易见,如果 80%的法律界业内人士认为法律实施状况差,那么社会秩序还能稳定吗?! 因此,当前中产阶层缺乏安全感、稳定感已成为其主要社会心态。那么一个缺乏安全感、稳定感的中产阶层,能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力量吗?

沈瑞英教授的这本著作研究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信息量大、理论性强,掌握和占有资料丰富,各种社会调查数据搜集翔实,引经据典、广征博引,有力地加强了其理论依据。二是其不仅仅着力于对当前中产阶层现实状况的调查研判,而且更关注其所处的政治系统和制度文化背景的探讨与研究,增强面向社会、实践的理论自觉。威尔·金里卡曾言:“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公民的素质和态度。”然“后发型”现代化社会,不是有了中产阶层,就会有西方理论所推崇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社会或谓公民社会的。在中国,贫瘠的公民文化培育土壤与生态环境,使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注定是艰难的。2010 年北京市中产阶层已超过 40%,有 540 万人,人均 GDP 也已超过 1 万美元,各项社会指标也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然京城社区在政府推动下成立的公民自组织——业主委员会的仅占二成,其中 48%的业委会主任曾受到威胁或殴打,竟只有 6%的业委会主任表示政府部门、派出所会积极介入处理。同样,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比重已达 54.8% (新中产阶层为 48.6%)。2010 年已有住宅小区 1 万多,成立业委会约有七成多,但却有九成业主对业委会不满,业委会工作处于种种冲突和困境中。更有令人笑不起的是一项关于北京、深圳、南京、沈阳、西宁五大城市“对社会组织管理地位认同度”的调研,其对业主委员会的认同度平均仅为 7.8%,对物业公司却达到 39.7%。为此,沈著研究指出:“没有健康发展的中产阶层,就没有健康发展的社会;而没有健康发展的社会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

马丁·路德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那么何谓公民呢? 卢梭认为:“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阿尔蒙德提供的诠释则是:“公民,——一个能够在其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它对在其中制定过的决策有影响。”而迈克尔·瓦尔泽 (Michael Walzer) 则指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

关键标志。”同西方学者对公民的认识相比较,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基于种种社会因素,在公民素养和意识方面同现代民主政治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对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公民社会构建是极为不利的。沈瑞英教授著作中,依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我国转型时期建设与发展公民社会的制度路径选择安排,如“观念先行、制度优先”模式;以“制度选择文化”、“制度引导文化”,积极推动公民文化发展;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政府必须理性主导、扶持与培育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以制度创新遏制制度性腐败,实现制度正义与社会和谐等。这些学术探讨是具有推动当前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现实意义的。

胡锦涛曾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又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很显然,这同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是密切联系的。因此,中产阶层问题是当前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现代化社会到后现代化社会,作为公民社会主体力量的中产阶层的崛起发展是必然的。中产阶层健康、成熟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改革成败。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近代西方社会中产阶层“内生性”自发生长的道路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已不可能再现。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环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中产阶层。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空间去容纳他们的崛起,没有足够的制度资源去供给他们的发展壮大,没有健全与完善的政策措施去引导、扶持与培育他们的发展,那么中产阶层的社会张力必然将导致社会秩序失稳、失范。这未必不是“盛世危言”。

如果不想出现这样的社会局面,那我们的体制与制度就要对利益主体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行为复杂化的中产阶层崛起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准备。执政党和政府就必须发挥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

何平立

2011年中秋于松江佘山北麓学府

目 录

1	应关注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代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视角与思考
5	二、理论思想脉络
29	三、研究框架与逻辑
41	第二章 结构与特征：社会稳定理论
41	一、多元与开放：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稳定理论
45	二、社会稳定：多维度系统工程
54	三、动态与发展：社会稳定类型和特征
58	四、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与社会稳定
69	五、结语：审思与启迪
72	第三章 理论与现实视阈的中产阶级品性
73	一、暧昧与摇摆：经典理论对中产阶级特性剖析
83	二、概念与边界：对中产阶级界定的理论问题
97	三、“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
108	四、祛魅与阴霾：西方中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特征
116	五、结语：矛盾与变量
120	第四章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特征与发展条件研究
122	一、当前中产阶层的构成与比例

125	二、“本土化”的中产阶层社会特征
134	三、促进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条件分析
140	四、结语：排除思想观念障碍
142	第五章 多重性、复杂性：中产阶层主要群体研究
142	一、知识分子群体分析
154	二、对公务员群体分析
164	三、对“白领”群体的分析
170	四、私营企业主群体分析
179	五、结语：多元、冲突与互动
185	第六章 “亚健康”与“亚稳定”：当前中产阶层问题析论
185	一、“亚健康”：当前中产阶层发育出现的问题
200	二、中产“亚健康”，社会问题化
210	三、“亚稳定”：当前中产阶层与社会冲突
223	四、结语：另一种视角下的中产阶层
228	第七章 改革与构建：公民社会与制度创新
228	一、西方市民社会与“中国模式”难以匹配
234	二、困境与反思：当前中国公民社会构建问题——上海市社区治理冲突 实证研究
247	三、在参与中发育的公民社会——中国环境保护运动实证研究
258	四、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与公民社会
283	五、结语：制度均衡——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枢纽
286	参考文献
292	后记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视角与思考

（一）研究目的

现代化作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性社会变迁过程,意味着社会整体系统的深刻变革,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充满着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调整,必然引起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重组以及价值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便从经济财富、政治权利、社会声望等维度来考察社会中不同主体的存在状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邓小平曾严肃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① 由此,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实现,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基础,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则有赖于对社会各阶层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取向的良好协调与有效整合。这是转型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国家政治体系所要应对的严峻挑战。

“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居于首要地位,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社会及其政治体制的存活与发展,保障现代化的延续、持续增长,以及任何制度领域的持续发展(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组织的领域),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② 社会学家埃森斯塔德的这一论断表明代表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等领域之全面发展的社会现代化,其实现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动力和重要内容。对此,政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4, 313.

^② S. N. 埃森斯塔德. 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57 - 58.

治学家李普塞特通过对 50 个国家进行样本分析后指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①但是，社会发展并非经济的单轨运行，经济发展也并非必定带来民主进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的军人政变，导致社会秩序和民主政体崩溃等经验表明，在现代化进程的较高水平上也可能伴生政治专制而非政治民主。^②并且，拉美在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使社会产生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经济危机，并导致中产阶级利益受到极大冲击，从而影响到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③现实促使学术界不得不对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进行反思。对此，亨廷顿曾指出：“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会产生政治不稳定，而且不稳定的程度也同现代化的速度相关。‘无论从静态或动态标准来衡量，向现代化变化的速度越快，政治上的不稳定就越大。’”“在 20 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得比早先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快得多，政治上的不稳定成为普遍现象。”^④由此可见，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社会结构的更替，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都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失稳、失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最本质的内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种区别于工人、农民两大传统阶级的新的利益群体——中产阶层正日渐兴起，有关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理论研究现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对此，国内许多学者在充分吸收近现代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理论预设进而作出判断：“中间阶层在技能、职能、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社会地位或权力等方面都处于中间状态。他们是现代工业社会中过着比较宽裕的中等生活的人，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对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起着缓解的作用，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美国学者威廉·汤普逊曾指出：“中产阶级‘既不陷于贫困也不流于奢侈，一般大多数是绝对地有道德的，既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又能努力为周围的人造福’。因此非常值得重视。”^⑤更有学者直接强调为：“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⑥不可否认，该理论作为一种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分析话语是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然而前提的排他性和研判的过

①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3.

② G. O' 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M]. Berkeley: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8.

③ 江时学. 阿根廷危机的反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④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50.

⑤ 聂运麟.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47.

⑥ 王坤. 中间阶层的文化品格及社会功能[J]. 北华大学学报，2004. 2, 25.

于理想化,导致其存在明显的偏颇与不足。

一是从历史发展维度审视,“平衡轮”并非中产阶级的先天性功能,“稳定”作用也非其固有特征或必然属性。这不仅可以从许多著名学者的理论研究中去分析:“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运动,它代表着既对资本主义也对社会主义、既对大企业也对大工会的抗议。”^①也可到近代以来中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或改革运动中的现实作用中考察。中产阶级“稳定器”说只强调其稳定作用,却忽视或回避了另一面潜作用——非稳定性,故具有偏颇性。

二是中产阶级由不同利益的职业群体所组成,在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环境中,其自身也充满矛盾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故中产阶级的政治图谱是五颜六色的,其是作为统一的还是分裂的阶级而存在仍是各界争论的焦点。如果它是一分裂的阶级,势必将很难发挥社会稳定功能。然而国内学术界很少有学者将不同于中产阶级“稳定器”说的其他理论作为立论依据和研究预设。

三是无论基于理论还是现实考量,社会稳定系统蕴涵着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互构与社会各阶层合作共赢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西方中产阶级“稳定器”说则强调市场和社会的竞争,过分倚赖市场能力和消费模式,带有明显的“精英意识”,忽视了社会“共生”关系。^②其体现的依旧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而非社会共生构建的和谐价值观,缺乏一定的世界宏观视野与社会全局观,说服力不足,必须审慎对待。

四是该理论以西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产生基础,即这一理想性价值判断是附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如直接用于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未必能完全契合。

为弥补和纠正当前国内学界在引进和吸收西方中产阶级理论过程中的偏颇与不足,本书在进一步梳理和理解中产阶级理论的基础上,在构建社会稳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对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特征、功能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辨析,以期能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有一个正确合理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探讨的基本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00.

② 日本学者井上达夫指出“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构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参见井上达夫. 走向共生的冒险[M]. 东京: 每日新闻社, 1992. 24-25, 116. 相关的理论观点可参考日本学者黑川纪章. 共生的理想. 卞崇道等译[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中国学者李思强. 共生构建说论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胡守均. 社会共生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等等。

一、如何正确理解和分析社会稳定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中产阶级仅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一个要素和变量,而不是一个运行机制,更不是一个系统。

二、如何正确研判与考量历史与理论中中产阶级的市场能力、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如何正确分析和解释中产阶级在社会责任、个体利益和行动能力之间的选择,以及其同政治领域的互动关系。

三、如何辩证认识中国“本土化”中产阶层的内部结构存在的异质化特质以及职业和身份上凸显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四、如何对体制、制度与社会背景因素影响下的当前我国中产阶层成长发展出现“亚健康”病态状况以及社会道德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降低等社会“亚稳定”状况进行理性的辩证分析。

五、如何从公民社会与制度创新层面视角认识西方市民社会与“中国模式”难以匹配。如何以科学发展观去实质性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以及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

六、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如何认识当下中产阶层在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与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关系。如何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关系中对中产阶层进行辩证分析,以及对中产阶级培育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

本书将力图从社会系统变量角度,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对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和社会稳定关系的阐论和分析,进一步研究与探索中产阶层发展的问题。

(二) 研究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必将对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对其研究已逐渐为国内学术领域所高度重视,并为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各方面专家学者普遍关注。与此相契合,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发展亦早已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具体来说,本研究的意义在于:

首先,对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理论意义。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首要条件。转型期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问题,而且构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本书在对西方社会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进行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我国具体国情和中产阶层发展现状的理论观念与研究范式,以求有效避免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和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误读、误判,进而为应对中国转型社会中产阶

层发展所带来的冲突与变数、风险与挑战提供更加准确的理论方法支撑,这对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其次,对深化转型期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正确选择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走向将取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及其在国家社会相互形塑关系中的作用发挥。本书以更开阔的视野、多维度的分析,通过合理划分中产阶级,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各阶层状况以及利益格局的变动、社会和谐的结构基础等,深化认识每个社会阶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和谐发展模式的现实构建,而且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及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再次,对正确认识中国中产阶层形成、发育和发展,合理定位其转型期社会发展功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通过对中西方比较研究,可以明确认识到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不仅难以匹配和适应中国“后发型”国家的现实国情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道路,更无法深刻认识和应对不同制度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张力中的不确定因素,以及由此造成的中产阶层社会发展功能异化的可能性。本书力图构建一全方位的发展战略,包括国家与社会可持续的良性互动互构的政治环境和发展机制,政府的制度设计、引导和积极培育,中产阶层自身文化内涵的修炼与充实,这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健康发育及其社会中坚力量和社会结构稳定基础的功能发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四,本书对倡导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共生共建、共享共赢的社会和谐理念和人本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转折期,本书在对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理论构建和现实培育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坚持认为只有倡导社会各阶级、阶层共生共建、共享共赢的社会和谐理念和人本价值观,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中国中产阶层的内涵发展和健康培育,进而弥补西方中产阶级“稳定器”说的片面性与不合理之处,具有重要的社会全局性意义。

二、理论思想脉络

对于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研究属于社会群体结构的范畴,需要以社会分层理论为论述基础,这种以地质学的“分层”概念解析不平等条件下社会主体的基本状态的研究方法,现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接受。然而以简单话语分析复杂问题势必会衍生出多样化的解释体系,加之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的不同,形成了社会分层理论的多种模式,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各种模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修

正。这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阶级理论及由此发展形成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阶级观；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和吉登斯阶级结构化的现代发展阐释；迪尔凯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阶层理论。此外，达伦多夫、布迪厄对社会分层也有自己的理解。

（一）阶级阶层理论谱系

1.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将“阶级”这一概念性分析工具用于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种基本方法，虽然很遗憾马克思生前未来得及对阶级做出明确定义，但其《资本论》等著作中对阶级的诸多涉及已经构成为比较系统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并非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根本条件，“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②生产资料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对其占有与否、占有多少直接决定人们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也决定人们的生存或生活方式。因此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对社会分层划分有决定性意义。除了经济因素的作用，马克思认为阶级利益、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受教育程度等也是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

在马克思阶级理论中，阶级意识与共同的社会行动是“自为的”阶级，如无产阶级的主要标志，如果缺乏阶级认同，最多是“自在的”阶级。^③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阶级的条件，必须具备相同关系，能够构成大的社会集团，有共同利益，行动一致，具有阶级认同感。因此马克思论述中的中产阶级，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只能是中间阶层、中产阶层。^④

2.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多种阶级观点：

主要代表人物普兰查斯主张多元决定阶级论，他在肯定经济因素在确定社会阶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⑤

美国学者巴巴拉·艾伦莱克和约翰·艾伦莱克主张社会阶级是由经济和文化决定的，他们认为，虽然经济因素是阶级形成的重要基础，但只有结合受教育背景、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47.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2.

③ 王建平. 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及其边界[J]. 学术论坛，2005. 1, 146.

④ 陈义平. 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J]. 广东社会科学，2002. 1, 134.

⑤ 余文烈. 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26.

亲属关系、消费形式、劳动习惯及信仰等社会文化因素才能形成不同的阶级。

而另一代表人物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赖特(Erik Olin Wright)则以剥削定义阶级,其理论特征是,阶级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对抗性。对抗的主要根源是剥削,而剥削的基础在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权。^①

3.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最早将社会分层作为系统理论进行阐释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其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一个“多元”结构,财富、权力和声望成为划分社会阶级的综合标准,由此也完成了从阶级冲突必然性到阶级地位竞争条件性的理论转换,构成了社会分层理论的第二种流派。韦伯认为分层是社会权力的有组织的表象。他把权力分为行为的三个领域:经济、社会和政治。在这些领域中,权力依次用阶级、身份和权力(政党)来标志。“‘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是一个社会中权力分配的现象。”^②

从经济领域看,韦伯视阶级为经济制度下的产物,但并不导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他以个人及群体在劳动市场中的处境为重要条件,认为市场处境不同,不同行业在市场拥有的“议价能力”就不同,从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就不同。这必然造就不同经济地位。从社会领域看,韦伯以社会声望的分布状况作为分析基础,以身份集团作为定义,认为一群有共同地位、受相似教育、来自同一种族、相似家庭背景中长大,并有着类似生活方式者可被称为同一身份集团。从政治领域看,韦伯指的政治是社会内权力分布。他认为财富的拥有会同时带来政治权力,这可以用政党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总之,相比较马克思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阶级理论,韦伯更加强调一种多元社会分层,该种分析模式对西方学者影响深远,此后的社会分层理论大多以此为基础进行发展研究。

4. 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对社会分层的理解主要体现于其独特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中,他将阶级关系视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将韦伯的市场力量发展为“市场能力”,并结合准技术关系作为分层标准,进而在两者的互动中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研究。吉登斯认为,阶级社会起源于阶级关系占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以市场条件下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为标准要素划分了三种市场能力,并以此构成上层、中层、下层阶级结构的基础。市场能力的差异性还意味着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与变化,以此促成新的阶级结构产生,而新的阶级结构又会为阶级主体所利用,形成新

^① E. O. Wright. *Classes*[M]. Longdon, 1985. 34.

^② Gerth and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81.